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名家特稿

协助郭化若将军修订《孙子今译·代序》始末

吴如嵩

(军事科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郭化若将军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孙子今译》是其代表学术著作之一。遵照毛泽东主席“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的指示,1973年,郭化若将军着手进行《孙子今译》及其序言的修订工作,吴如嵩等三人受军事科学院委派协助完成该项工作,至1977年该书修订本出版。吴如嵩先生深情回忆了自己参与修订工作的始末、其与郭化若将军的日常交流,并介绍了郭将军对孙武姓源与故里、《孙子兵法》研究中“古人现代化”与“批判吸收”等问题的见解。这既有助于体悟和传承前辈学人求真务实的为学精神,又有利于推动《孙子兵法》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郭化若;《孙子今译·代序》;《孙子兵法》;孙子故里;批判吸收

中图分类号: K 206.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cnki.1673-2618.2023.03.003

一、缘起

1973年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年。这一年,我有幸与不少学术大师近距离接触,瞻仰他们儒雅谦和的风采,聆听他们春风化雨般的教诲。这使我切身领会到马克思关于科学入口处的名言:“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415}

这一年,我遇到的“科学的入口”处便是《孙子兵法》研究这一件大事。夏秋之际的一天,领导通知我说:“宋院长要召见你,这就去!”赫赫有名的宋时轮上将要召见我这个小干部,我虽然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已有十年之久,也无数次地见过宋院长,但从未单独打过交道,心中好生忐忑!

见到宋院长后,我才知道他竟然交给我办一件使我既感受宠若惊,又感诚惶诚恐的任务。他对我说,郭化若副院长在南京军区当副司令时,

于1961年出版了一本《孙子今译》。这本书因为存在一些错误,受到了批判。现在,经毛主席批示,要他重新写一个批判吸收性的《代序》,其书可以再版。郭化若同志年逾古稀,需要有人协助编写。组织上决定派孙克骥同志(待分配,原政治部主任,不久升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奚原同志(待分配,原战史部副部长,不久升任军事百科全书部长)和你三个人协助郭化若修订其《代序》。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对我这个对《孙子兵法》粗知皮毛的年轻人,所谓“协助”只不过是抄抄写写,打打下手而已。虽然承担了这个协助修订的任务,但此事(以下略称“郭序事件”)的真正起因和来龙去脉却远非当时的我所能了解的。

直到后来在宋院长主持召开的一次院首长办公会上,好几位院首长都对郭老提供的送审稿提出修改意见时,我才从曾任战理部部长、时任副院长的高体乾将军的发言中略知“郭序事件”

收稿日期:2023-05-02

作者简介:吴如嵩(1940—),男,贵州铜仁人,研究员,少将,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研究。

E-mail:wu_rusong@sina.com

的端倪。我列席会议听到高副院长感人肺腑而又高屋建瓴的发言后,既感到惊异又倍觉亲切。因他是内部谈话,我不敢外传。直到1999年《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出版,高副院长撰文《相知愈久,友谊弥深》公开披露若干细节后,我才在《经师不易得,人师更难求——向郭化若将军学习〈孙子兵法〉的一些片段》的怀念郭老文章中谈到一些有关情况。^[2]

“郭序事件”起于青藜之末:1963年露出了苗头,非议日多,并且上报到中央军委总部,罗瑞卿总参谋长批示军事科学院对“郭序”进行研究,院领导指示高体乾部长组织专人分析讨论,得出结论上报总参。高部长通过院里写了一个报告上报罗总长,认为郭老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系统的,他批判地继承了古代军事遗产,为我军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该报告也就序言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看法与郭老商榷。

然而,1964年又有人撰文批判“郭序”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政治问题。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又批示军事科学院组织人再次研究“郭序”。高部长仍然顶住压力坚持认为“郭序”只存在学术问题、方法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不久,“文革”开始,“郭序”问题被再度上纲上线。郭老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南京军区将材料上报军委后,叶剑英元帅又将该报告转到高部长手中,让他再次提出看法。当时,部内也有人竭力主张将郭老批为“三反分子”,争论十分激烈。还有人诬称高部长是保郭化若的“保皇派”,是“伪君子”。难能可贵的是,高部长对于那些污蔑之词一笑置之,仍然坚持“郭序”没有政治问题的原则立场。对于他这一坚持正义、胸怀坦荡的高贵品质,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无比敬佩。

可惜的是,高部长的努力无济于事。从1965年秋开始,郭老就被“隔离审查”,1969年8月被免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69年至1973年,他更是被安排到合肥“休养”,且不允许离开南京军区的辖区。^{[3]743}

郭老后来回忆说,无论他们给他罗织多少罪名,他只承认一条:在孙子研究中有古人现代化的错误,别的概不理睬。因为我心中有数,用孙子研究打不倒我。

他心中有什么数呢?这数就是:研究《孙子兵法》是1938年秋毛主席在延安当面赋予他的任务。后来,这一任务也一直得到毛主席的鼓励与支持。

1973年7月20日,郭老在合肥冷清的休养屋中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了“御状”。不到一个月,8月4日,毛主席给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写信:“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望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4]360}

“郭序事件”终于尘埃落定,郭老于是来到北京任职,他在欣喜之余于1973年5月写了一首题为《无题》的七律:

星槎疑梦抵幽燕,一曲歌吟动九天。
许邑夺旗成往事,大梁脱厄纂新篇。
长江浪送千帆过,大地春回万木鲜。
鼎沸五洲昏欲雨,翱翔海鸟掠云烟。

“大梁脱厄纂新篇”既表明了他遭遇了如同孙臆被庞涓陷害终于逃脱大梁的喜悦,又表达了他将如同孙臆一样“孙子臆足,《兵法》修列”创作出新的论著的决心。

在郭老就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六年之后,1979年8月13日,南京军区党委在《关于给郭化若同志平反决定》中指出:在“对郭化若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作免职休养也是错误的”^{[3]744}。郭老看到这个决定时,他的《孙子今译·新序》早已重新出版,畅销国内外了。

二、郭老印象

我从宋院长那里领受任务不久,郭老的秘书王兆春同志便通知我说,郭老要在某日接见我们三人小组。

郭化若的大名,如雷贯耳。但是,我与他从未谋面,甚至连照片也没有见过。久历戎行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将帅之中大体上是两种类型:一类是儒雅多智的儒将,一类是赳赳武夫式的“虎将”。那么,郭老是哪种类型呢?

一天,上午10点左右孙主任、奚部长和我三人来到郭老的住地,郭老身穿一套银灰色的中山装,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连声表示:“欢迎,欢迎!”茶几上整齐地摆放好茶点水果和大中华牌

香烟。

会面在亲切、随意、坦诚的气氛中进行，一边品着六安瓜片，一边高谈阔论。孙主任与奚部长都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这时孙主任已是正兵团级高官，他谈吐矫健，仪态端庄。我认识他还是1965年在唐山搞“四清运动”时，他具体领导军事科学院去的“四清”工作队。由于他不久就离开三人小组去南京军区荣升副政委了，因此对修订《代序》工作虽然出了不少主意，尽了不少力，但毕竟时间不长。

奚部长来军事科学院较晚，他一生坎坷，在上海工作时期受张春桥迫害，“文革”中竟被投入监狱，饱受折磨。其实他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儒，精通文、史、哲，书法、篆刻、考古样样在行。在协助郭老修订《代序》工作中他的贡献最大，居功至伟。

当天在郭老家中的会面很有成效。先是郭老把《代序》工作做了简略的介绍，表示既然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就决心按照毛主席“批判吸收”的指示精神对《孙子兵法》做一次认真深入的研究，争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廓清“古人现代化”错误的根源和表现，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同时，他也打算对孙子生平和其书的版本、校注、翻译和成书问题都做一次详细的研究。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么一件工作竟断断续续地拖了好几年。不过，在这几年中，通过与郭老的朝夕相处，我对郭老的道德文章有了较多的了解，受到了远胜于耳提面命的教导。

郭老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慈眉善目、平易近人。会面那天，他也要我讲一讲，说：“老吴同志，你有什么想法，讲一讲吧。”我简单地说了下努力工作的态度，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自第一次见面称我“老吴”，这个称谓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过。而他对我的这个称谓曾让我好不尴尬。战理部是全院第一部，在礼堂开会时位于第一方阵。有一次，院首长从池座登上主席台正好从我们前面绕过，郭老发现了我，微笑着对我打招呼：“老吴同志！”当时战理部多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平时都叫我“小吴”，郭老这一声招呼，顿时引起在座的同志起哄：“老吴同志，郭副院长叫你呢！”一时之间，我被弄了个大红脸。

郭老的官阶够大的了，但从他身上看不到那

种官派习气，他总是那么平易友善。1974年中秋节前夕，郭老到我家探望。^[2]我住的是两间斗室，一条狭长的过道如哑铃结构，一间斗室，置放三张单人床，如乾卦排列。岳母与两个外孙居住，门边放了一张硬板凳，郭老便欣然就座，我夫妇与岳母不便坐在床上，只好依墙而立。

那天，郭老始终眼含微笑地与我们交谈。一开始，他指着两个孩子对我说：“这就是你飞车绝技的孩子吧？”我一听，哈哈一笑，连忙回答：“是的，是的。”原来在不久前组织上为了照顾我接送孩子，分给一张自行车票，我向田地同志借了一百块钱买了一辆永久牌28寸钢管加重自行车。有天早上，我骑车送孩子去幼儿园时在门诊部门口遇见了郭老，我来不及下车，只向他点了点头便从他身边飞驰而过。因此，他戏称我飞车绝技。

谈话间他又问：“你们都是贵州人吗？”他说：“当年长征时，贵州真穷啊！穷人叫作‘干（乾）人’，穷得一家人只有一床被子，甚至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红军去后，‘干人’获得了解放，热烈地拥护红军。不少年轻的‘干人’踊跃参加红军。”那天，郭老谈兴甚浓，我怕他口渴便对他说：“郭老，喝点水吧，不过没有茶叶。”他说不渴，一会儿警卫员从车里把他的茶缸端了过来，他推开了。显然，他这一举动是表示对我们的尊重。

那天，郭老还送给我们一箱特供的月饼，它与当时凭票供应的“坚如磐石”的月饼不可同日而语。郭老走后，两个孩子迫不及待地饱食一顿，大快朵颐。

常言说，学为人师，德为人范，郭老无疑是我们的表率。我常常从一些小事上就感受到他的风范。

记得有一次，我根据郭老和孙、奚二位首长的意见起草了一篇关于孙子运动战思想的文稿。郭老改稿从不潦草，对我这篇文稿他改来勾去，几乎面目全非。我看后便对他说：“首长，稿子您几乎全都改写了，划个对角线就是了，何必费那么多精神这样改？”他笑了笑说：“我这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这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有一次我看到毛主席修改别人一篇文章，有一页只剩一个‘的’字还保留着。”他接着说：“毛主席一

贯主张文章要写得精练,反对写懒婆娘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的酸文。还说过,如果写文章也像发电报一样,多一个字多收一个字的钱,写长文的风气就改变了。”

责己严,责人宽。郭老从来遵循严格要求自己的原则。不拉小圈子,反对任人唯亲。他每次升迁,从不带秘书、警卫,而是听从新单位的安排,更不安插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

但是,他对于确实不公的事也敢于仗义执言。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对于人事问题我开过一次口,就是在谈到李大磊同志的问题时提出了一次建议,他竟然采纳了。

李大磊是战理部古代兵法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1927年的中共党员。1950年保卫大上海时他担任高炮师师长,是郭老的直属下级。可是他直到离休仍然是正师级。郭老听到这个问题后,说:“大磊同志我熟悉,老同志,有战功,他的问题我可以在院党委会上提出来。”不久,李主任被任命为战略研究部顾问,享受副军级待遇。

郭老文史兼修,多才多艺。他的书法兼师颜柳,端庄稳健,字如其人,任全国书法协会副主席。他来院后,不少老同志很想珍藏他的墨宝,我曾受好几位老同志的嘱托向郭老求字,他都有求必应。

郭老还是诗人。他的古典诗词严格地遵守格律却又生动自然,毫不板滞,非有深厚的造诣难以达到。2004年郭老一百周年诞辰时,军事科学院隆重召开了纪念大会,我被指定在大会发言,并将发言稿《志壮情深的革命诗史》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5]

郭老逝世后,1999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长达60多万字。军政各界不少社会贤达都撰文缅怀郭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年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同志的文章《金石掷有声——记福州乡贤郭化若的青少年时代》^[6]。

郭老遽归蓬壶快3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那高尚的品德和深厚的学养,永远值得怀念。与他相处,真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所感所知,犹如初春的细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郭化若将军是一位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的革命前辈!

三、姓源与故里

在人物评价问题上,孟子曾有一个关于知人论世的著名论断:“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7]342}意思是说,认识一个人,读懂他的书,必须了解其家世背景,并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所论之人。

然而,在郭老的旧序中对于孙子的家世和经历几乎没有必要的论述,只是在其书后附了一篇司马迁的《孙子列传》。不过,他在1939年撰写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中沿袭1936年李浴日的观点,即孙子是齐国孙书的后裔,故里乐安即今山东省惠民县。这次的《新序》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放在首要位置加以叙述。

就在《新序》即将定稿送审之际,我在院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发现了一则新的材料,一时之间,颇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意味。

台湾刘青衫先生在《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孙子的兵书与战法》的文章。据称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热河省(今内蒙古、河北、辽宁境内)发现了一本名为《古史拾遗》的古书,作者是北宋神宗时的沈立。书中载有萧吉关于孙子身世的记述,另立新说。据《古史拾遗》记载,孙武子的父亲是卫国(今河南、河北与山东部分地区境内)的贵族孙敬仲,从卫国避难来到莱城(今山东莱芜、泰安间)。公元前559年,孙敬仲与齐国南史馆(类似现代的图书档案馆)的史官南史的女儿结婚。公元前557年,孙武便出生在古莱的石闾山下。因其掌内有纹,像个“武”字,便取名孙武。孙武三岁丧父,六岁丧母,便由外公南史抚养,因而得以学习齐国先贤姜尚、管仲等人的言论、事迹和齐国的典章文献。后来,晏子发现孙武才华出众,专门介绍他与兵学家田穰苴相识,使孙武的兵学造诣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元前542年,外公病故,孙武守孝三年。公元前539年应征入伍,当兵期间曾随齐景公到过晋国。当兵三年之后,乃回乡过着耕读生活,观察天下形势。他看到吴国政局动荡,决心出游,以行医济世的方式周游卫、郑、晋、秦等国。公元前527年,吴王余昧病死,公子光杀死吴王僚,自立为王。公元前515年,孙武到今安徽潜江的罗源山隐居,削竹著书。公元前512年,经伍员力荐,吴

王用高车驷马礼聘孙武出山,此时孙武已是46岁的年纪了。

萧吉是隋炀帝时人,博学多通,著述颇丰,史书记载他著有《萧吉注孙子》,后失传。我向郭老汇报这一番记述后,他大为惊异,遂请求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协助查找《古史拾遗》。北图很帮忙,在它本馆以及京内外几大图书馆查询,均回答既未见此书的著录,更无此书的馆藏。

当时,面对这个问题,郭老颇有感慨地说:“好读书不求甚解。知识的海洋太博大了,对许多问题只能不求甚解。古人认为天圆地方,现代科学终于发现人类是居住在地球这个地球上。我们只能相信科学家的结论,只能知其然不求知其所以然。但我们作为《孙子兵法》的研究者,对于孙子的生平事迹,就应当在现有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力求知其所以然,力求‘甚解’。”

“学非探其花,要自拨其根。”(杜牧《留诲曹师等诗》)。于是他当时决定在两个问题上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一个是姓源问题,一个是故里问题。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

关于姓源问题,孙姓有三个族源:有舜氏的妫姓孙、后稷的姬姓孙、祝融的半姓孙。

半姓孙与孙武的关系在学术界基本不予认可,故不讨论。

关于妫姓孙,大体脉络是这样的:周武王灭商建国之后,将长女嫁给舜帝后裔妫满为妻。公元前1046年,妫满受封于陈地(今河南柘城),后迁都宛丘(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约在今河南省东部地区。妫满及其族人奉祀舜帝。妫满是陈氏的得姓始祖。公元前672年,陈国公子陈完因为避乱逃到齐国,任齐国大夫,改称田完,其后裔以田为氏,即妫姓田氏。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字子占,他“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8]2945}。因此,孙书成为妫姓孙氏的得姓始祖。

萧吉在《古史拾遗》披露,孙武是卫国孙敬仲之子,孙敬仲因为避难奔齐,在齐国生下孙武。孙敬仲是卫国孙林父(孙文子)的从兄,孙林父是姬姓孙氏的姓祖。其族源可以上溯到卫康叔,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八子,也是小儿子。

即使是采纳萧吉所言,那么孙武尽管生于齐

国,其祖籍也在卫国。换言之,孙武也不是今山东省人,而是河南省人。经过一番考辨之后,郭老坚定地做出决断:孙武子是妫姓孙氏之后,其故里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为什么郭老这一决断是正确的,也在其后的论证之中愈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呢?

孙武的姓源和故里问题之所以在后世的史料中乱象丛生,乃是因为中国自秦汉以后进入了战乱不息、分裂割据的时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愈演愈烈。于是,大批的豪族大姓沦亡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造成“公侯子孙,失其本系”^{[9]990}的局面。唐朝统一全国后,面对这一情况,为了重新建立士族门阀的统治秩序,唐太宗令高士廉等厘定氏族谱系,划分士族与庶族的范围。高宗显庆四年(659)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进一步将晋升士流的范围扩大,命令各地上报谱牒之书。但是,这些私家谱牒“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10]3153}。由此可见,当时一些人出于个人、家族或地区利益的目的,为了攀高枝,傍先贤,鱼龙混杂,穿凿附会,假冒伪劣的谱牒碑刻问题是何等严重!因此,《古史拾遗》如果存世,即使不是恶意炒作之书,但至少它不是官修的正史,因而对于郭老所持观点毫无影响。因为,“乐安说”严格采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方法,采用的史料乃是唐宋两朝政府经过审慎考辨、拨乱反正的正史记载。当初林宝、欧阳修、邓名世等修史时,对“诸家图牒无不参详”^[11],因此是最可信的、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至于孙子故里问题,也必须采取探求孙子家史的路径进行考辨。1991年3月12日新华社通稿中报道了郭老对否定孙子故里惠民说的观点的批驳。他说:“我的论著中一直是持惠民说,现在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意见。在我看来,惠民说也罢,广饶说也罢,关键在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孙子故里考辨是可以向前发展的,但目前我不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12]257-258}郭老坚持的孙子故里惠民说是正确的。一般而言,探寻孙子故里问题,无非是两种方法:一个是从地下寻找的考古方法,另一个是通过史料考辨的论证方法。考古方法当然可行,问题是在哪儿考

古发掘?因为“乐安”(乐业安居)是一个美好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今山东、河北、河南、四川、贵州、江西、广东、湖北、黑龙江等省都有以“乐安”命名的郡县城镇。但是,孙子故里的乐安只在齐国,即山东省境内。它在山东省哪个方向呢?复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的周维衍教授提出“孙子故里广饶说”,认为孙书食采的乐安“是一广袤的地面”,“主体”在今广饶境内,距齐都临淄不远,等等。^[13]殊不知,周维衍教授这一判断是错误的。

那么,孙书的采邑应该在齐国哪个方向呢?据《周礼·夏官·司勋》记载:“凡颁赏地,参(三)之一食”,郑玄注引汉郑司农曰:“不以美田为采邑。”^[14]⁹²⁷也就是说,卿大夫的采邑必须远离都城,不给予肥美之地,其实际收入仅相当于肥美之地同样大小面积的三分之一。

那么,采邑有多大呢?据《文献通考》卷六十五记载:古制规定,“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孙书的地位是齐卿,其采食依制应为二百八十八人,也就是小小的一邑一乡而已,且又偏僻,远离都城临淄。

由此看来,周维衍教授说孙氏采邑乐安“是一广袤的地面”乃是无根之谈。但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国却有着广袤的地面。今天,在山东省去发掘两千五六百年前的一个仅有人口二百八十多人的民居无异大海捞针!

于是,郭老仍沿袭传统说法去考究旧史。最早记载孙子生平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15]²⁶³¹虽然仅此一句,但他至少明确了孙子是齐国人,不是什么卫国人。那么,说惠民是乐安,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呢?是清朝乾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而又自称是孙武子后裔的孙星衍。他依据宋代硕儒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等明确表示:“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16]²民国著名《孙子兵法》学者李浴日也据此认为:“唐代之乐安郡,即清代之山东省武定府,今之惠民县附近。”^[17]

孙星衍与李浴日主张从唐朝乐安郡入手去考察孙子故里,无疑是正确的。正如前文所说,唐朝政府大力搜集天下谱牒如唐朝林宝的《元和

姓纂》,目的是重新建立被长期战乱打碎了的统治秩序。于是,孙子的得姓之源、祖籍所在、郡望由来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解开了千古之谜。

天宝元年(742),唐玄宗下令改州为郡。棣州被改为乐安郡,而棣州是今山东惠民县并无疑义。为什么棣州改为乐安郡便是孙子的故里呢?因为这时的乐安已不是乐业安居的“休令之名”,而是圣贤之地,是兵圣孙武的故里。于是孙氏之族开始有大量的“乐安子”“乐安男”“乐安郡公”“乐安郡侯”,死后追封为“乐安伯”,其妻、母、祖母、曾祖母皆为“乐安夫人”,享受兵圣孙子的殊荣和贵族身份。

郭老穷追旧史廓清了孙子故里的端绪由来,他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又得到军事科学院秦汉军事史研究专家霍印章研究员的进一步论证。他发现了十四篇孙逖家族墓志铭以及其他汉唐史料,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后,惠民县的吴名岗、郭克勤也都著书立说对郭老论点做了强有力的支持。

著名学者王国维说得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8]王国维先生的这一科学理性的忠告应当成为后世学者践行的原则。

四、关于“古人现代化”与“批判吸收”

郭老受到批判时,只承认犯了“古人现代化”的错误,后来他给毛主席写信时也是检讨自己犯了“古人现代化”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对其所说的“古人现代化”问题未置一词,而是要他重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

郭老遵照毛主席指示,先后向胡乔木、邓立群、胡绳、杨宽、庞朴等大师和专家学者移樽就教,他们也都热情接待,真心相助。经过研究,大致理清了这样一些头绪。

第一,取象比类是人类最原始的认知方法,孙子从四季的变化、五音、五色、五味的变化受到启发,用以比喻兵力的使用和战术的奇正变化也是无穷无尽的。军事上的技术装备和战略战术的演变,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都是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发展的。比如,人们从鸟的飞翔发明了风筝,从火药的发明制造出可以远距离进行火攻的“神火飞鹤”,都是如此。

第二,中国历史延续到清朝末期,出现了两个终结:一个是封建社会走向终结,另一个是清王朝走向终结。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工业革命,西方列强向外侵略扩张,凭借其坚船利炮侵略中国。腐朽的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一些知识分子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竟无耻地提出“全盘西化”之类矮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反对抛弃传统,主张创新国故。例如,早在 1908 年,鲁迅先生就曾经明确地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9]166}意思是说,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但不能失掉其精华,“弗失固有之血脉”,而应融会新知,固本创新。近代以来,鲁迅的这一见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在古典兵学研究上,即使有一些学者试图保存《孙子兵法》,使其不致被弃如敝屣,给它牵强生硬地披上了一层西方军事学术的外衣,其结果不伦不类,依然未能确保其精华血脉。例如,萧天石套用西方军事学的框架和分类方法,把《孙子兵法》固有的概念辩证法体系生搬硬套地移用在诸如国家指导原则、政治战指导原则、外交战指导原则、间谍战指导原则、先知原则、目的原则、计划原则、安全原则、速战速决原则、歼灭战原则、保卫战原则、闪击战原则、主动原则、攻击原则、集中原则、奇正原则、虚实原则、因敌原则、诡变原则、机动原则、协同原则、简单原则、秘密原则、利动原则、火攻原则、各种地形战斗之指导原则、统御原则、任将原则等方面。^{[20]214-266}这样的比附,显然背离了《孙子兵法》固有的统绪。比如,“闪击战”明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实行侵略战争采用的一种战术,具有鲜明的侵略色彩,怎么可以套用到孙子头上呢?诸如此类“古人现代化”的现象,古今

中外均皆有之。马克思就曾嘲笑费尔巴哈,说他在抵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时也将辩证法思想一概否定了,就如同“倒掉洗澡水连孩子也倒掉”的愚蠢村妇一样。毋庸置疑,郭老所说的“古人现代化”错误,既不是丢掉《孙子兵法》的优良传统,更不是崇洋媚外,把《孙子兵法》的学术体系改装成西方的军事学术体系!

第三,“批判吸收”,精滤《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和哲学意蕴。《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最古老的兵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学习它,是我们中国人独享的幸运和骄傲。它太古老了,距今 2500 多年,它那古老的汉字又加之一词多义的特点,要把它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实属不易;要把它在军事学术上所使用的独特的概念范畴体系与当今的军语和军事体系合理地、准确地联结起来就更为不易;还要看到,《孙子兵法》又是一部舍事而言理的,极富宏观、整体、思辨特征的战略著作,要达到早在 1939 年毛主席当面嘱示郭老的一段教导,就更是难而又难了。毛主席强调指出,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研究孙子,就要批判和反对那些曲解孙子的思想和贻误中国抗战戎机的思想。^{[21]165}

此次修订《代序》,郭老力求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对《孙子兵法》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注意指出《孙子兵法》中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注意批判其英雄史观,注意准确界定其朴素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力求科学地、谨慎地诠释其古代军事用语与现代军事学术体系的有机连接。总之,郭老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指导思想下完成了《新序》的写作。该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吴如嵩.经师不易得,人师更难求:向郭化若将军学习《孙子兵法》的一些片段[J].滨州学院学报,2018(1):5-8.
- [3]沈效良.郭化若生平活动大事年表[M]//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 [4]毛泽东.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5]吴如嵩. 志壮情深的革命诗史:为纪念郭化若将军百年诞辰而作[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08-09(7).
- [6]习近平. 金石掷有声:记福州乡贤郭化若的青少年时代[M]//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 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 [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孟子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8]欧阳修,宋祁,范镇,等. 新唐书:10[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魏徵.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0]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4.
- [11]林宝. 元和姓纂[M]. 清光绪六年金陵书局校刻本.
- [12]张建国,孙兵. 孙子故里研究集粹[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 [13]周维衍. 孙武故里乐安在今广饶说[J]. 管子学刊,1991(3):80-83.
- [1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周礼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5]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6]曹操,等. 孙子十家注[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 [17]李浴日. 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8]王国维.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 [19]鲁迅. 鲁迅全集:1[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20]萧天石. 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M]. 成都:大江出版社,1942.
- [21]郭化若. 郭化若回忆录[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The Process of Assisting General Guo Huaruo in Revising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Art of War: Preface*

WU Rusong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General Guo Huaruo is an outstanding military theorist and expert in the study of *The Art of War* in China, and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Art of War* is one of his representative academic works. In 1973, General Guo Huaruo started to revise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Art of War* and its preface, Wu Rusong and other two experts were appointed by the organization to assist in completing this work, and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1977. Mr. Wu Rusong affectionately recalled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vision work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his daily communication with General Guo Huaruo, and introduced General Guo's insights on the origin of the Sun Wu's surname and his hometown, as well as the issu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ncient people" and "critical assimila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Art of War*,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and inherit the spirits of seeking the truth and pragmatism from previous scholars, but also promot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Art of War*.

Keywords: Guo Huaruo;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Art of War: Preface*; *The Art of War*; the hometown of Sun Tzu; critical absorption

(责任编辑:许 金)